



# 我们的文学共同体

□汪政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与物质生活期望同步提高的就是精神生活的期望指数。过去被认为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许多过去需要花费巨大学习成本才能拥有的技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学习环境的建立也变得平常而容易,而随之得到开发的是人们对精致生活的体验与欣赏能力。这样的现实应该得到社会管理部门、专业团体与专业人士的重视,成为社会建设与公共管理的日常内容。类似的想法也不知起于何时,但随着这几年中国小说学会与兴化市人民政府的合作,它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兴化已经是“小说之乡”,这样的称号与评价是建立在兴化这座苏中小城的小说传统与小说现实的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就有三部与兴化有关,特别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就是兴化人,在《水浒传》中可以看到许多这片土地的影子与生活的痕迹。说兴化是小说之乡,不仅是它有着傲人的小说传统,更因它不凡的小说现在。兴化的小说现在进行时不仅是从这里走出了毕飞宇、朱辉、梅国云、鹿余亮、刘仁前、顾坚等小说名家,更有在本土创作的无以计数的业余小说家们,夸张一点说,读小说、编小说、写小说已经成为兴化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因为前些年所谓的文学的边缘化而萧条,相反,却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普及。人们不应该忘记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的规律,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是随着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是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以为人们都去追求物质了,将精神扔在了一边。所以,兴化现在提出从“小说之乡”走向“文学之城”,不仅显示了兴化社会建设的智慧与远见卓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是地方文化诉求的凝聚。我们看到,2018年的兴化,毕飞宇工作室持续开展活动,更大规模、更加系统、更加多样、更加有效的文学活动穿过了这个城市的春夏秋冬。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成功举办。兴化文学发展研讨会也在秋天举行。这个研讨会不是对兴化既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不是成果的展示,而是论道、是探讨,探讨一个城市的文化气质与文化资源,探讨文学会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特别是会给这个城市的人民带来什么,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一个城市的品质,又会给民众带来多大的幸福指数与文化参与上的获得感。文学在兴化,不是修辞,不是装饰,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兴化的文学人口正以不可想象的幅度增加,兴化人正在成为文学人。

中国小说学会的专家们有幸见证了这样的变化。近年来,兴化的文学生活就变得如此的普及、深入,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文学共同体。这个文学共同体是开放的,有着海量的文学吞吐量,四面八方来的文学人士来到兴化,兴化的文学在走出去的同时不断得到外力的支撑与审美的供养。这个共同体又是丰富的,政府、企业家、民众与专业人士为了文学走到了一起。以中国小说学会而言,它对兴化文学是深度介入的,兴化对学会又是高度认同的,许多原先的合作构想已经成为现实,专家们带给了兴化新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教育,而兴化的文学生活也给专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动态的、常新的研究样本。中国小说学会与兴化的合作只是这个共同体运行的个案,更多的方式和案例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我相信,它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新时代多样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

## 新时代的“自我”面向

——2018年中篇小说述评 □刘阶耳

中篇小说：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收获》2018年第2期

王祥夫：《一粒微尘》

《山花》2018年第9期

林森：《海里岸上》

《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

鲍十：《岛叙事》

《钟山》2018年第1期

李宏伟：《现实顾问》

《十月》2018年第3期

二湘：《罂粟，或者加州罂粟》

《江南》2018年第5期

郭爽：《九重葛》

《收获》2018年第4期

易康：《恶水之桥》

《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朱文颖：《有人将至》

《钟山》2018年第4期

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

《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

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遴选的10部中篇小说,出自名家之手有之,也不乏新人新气象。其中林森的《海里岸上》、鲍十的《岛叙事》所提供的叙事“增长点”绝对新鲜而且必要。《海里岸上》平行展示“海里”、“岸上”迥异的生活景观,并置着一位老人驾航出海过往沧桑,及其生活的小镇被打造成观光景点后斑驳乱相。林森的小说以老人的视角综合摄取的思考,极其超迈。小说结尾对“出海”仪式隆重叙述,从饱满的写实的日常景观中寄寓的昂扬的象征意涵,不啻为奋劲的民族魂续写新的乐章。相形之下,《岛叙事》则略显朴拙,这或许是因为它过于偏重对“岸上”异样的日常景观的叙事打造了,过往的悲欢与诗意的栖居相折冲,轻逸或空灵自然跟不上,又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用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思考现实呈现下中国经验的李宏伟的《现实顾问》,属于另一类的轻逸。某家“超级现实公司”通过其产品,意图将使用者终生拴死在其系统上,扩张的野心与白条湖的原居民发生了矛盾,主人公受命处理这个难题。小说以由此引出的资本借助高科技技术对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渗透的文化隐忧,将不可逆转的“拟象”世界全面屏蔽的人性刻奇化、马赛克化的真相给予委婉的揭示。完美的“现实呈现”与大地栖居者获得的存在感显然须臾不可分离。想象拼图荒诞,诗意关爱贴切,类似的文化情怀,到了迟子建的笔下更是一骑绝尘,气象妍妍。

用地方志联结中国故事的叙事拼图依旧被《候鸟的勇敢》所沿用,可其活色生香通幽处锐不可当,对候鸟栖息地的开发与保护,是执守者的信念所系,是面向天空和大地的历史与人性的原罪般的救赎意志的激昂展示,是诗意悲悯的潜伸与回转;于是,萦绕绿水青山间的幸福愿景,反衬出“候鸟人”随性迁徙的颓颓或轻慢;自由与爱赋予的存在的一种德性之美,接近于“知识考古学”式的发问,实为2018年度中篇小说极其珍贵的收获。

朱文颖的《有人将至》深入婚恋心理的幽微层面,显示了日常化叙事的别异境界。它就“私人诊所”大夫介入其病人生活空间的角度,将个人感情的困扰与生命孕育、呵护亲情联系在一起,不失温情地慨叹当代人精神困顿的现状,分寸拿捏精准。新时代的“自我”面向见于其他的上榜作品,更是各怀禀异,奇趣竞呈。

作为“90后”的文学新锐,王占黑的《小花旦的故事》意义不容低估。它所关注的大都市里弄庸常人生,让久违的市井气在日益繁盛的都市景观中弥漫开来,有助于抵消物质化外表炫示,及外乡人凝视之类同质化的叙事模式。纵使它看到的是都市繁华下的寒俭,可也不失为是对城市中国崛起的日常景观的严肃谛视。小说以“异故事叙述”的方式,统摄生活底层者平庸的生活甘苦,又显然在“启蒙”叙事“含泪的笑”之外另辟蹊径;毕竟物质性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个体丰盈的精神需求才不致落于虚诞。王占黑娴熟的写实笔调,保证了人物“偷着乐”的饱满个性,蕴涵着极为丰厚的现实质感。

王祥夫《一粒微尘》中精微的写实笔调令人过目不忘。小说活灵活现地对大量琐细的日常器物进行适时勾勒,使得过往的生活氛围与人物挣扎的心灵拥有巴尔扎克般写实的精准度,围绕着主人公向组织交代早年的“糗事”,小说将平庸者的“恶”抖露得淋漓尽致,显然不再复像以往对“落难”知识分子那样予以美化,实在难得。

此外,以越南、阿富汗、美国为背景展开战争与人性思考的二湘的《罂粟,或者加州罂粟》,结构并置不待言,视野开阔,叙事品质尤甚聆人耳目。郭爽和易康的叙事意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表面上看,前者的《九重葛》接近还乡的叙事模式,但由于偏重于两代人30余年沧桑交集的回顾与审视,“80后”一代及其父辈荣辱不一的际遇、命运,于是又兼杂着成长叙事、反腐叙事那样的复调;当这般纷繁的故事枝蔓,由一个地方风物意象——九重葛——得以象征性贯穿,小说诉诸“地方志”的空间收拢,则不致出乎意料。后者的同样精致,师心使气处,先锋的叙事元素采用得恰到好处,不能不让人刮目相待。

一场凶杀案的目击人与受害者,出入故事“内”、“外”,饶有兴致地议论着凶杀案现场另一位当事人;“一日长于百年”式的叙事演进,将那位被议论的女士的悲情一生撮合在一起,以期突出她困于欲望而毫无所得,“看”/“被看”成就了《恶水之桥》的一条叙事“主线”。与此同时,小说还并置着另一对萍水相逢者(中年男子/美眉)在案发现场的另一处(咖啡店)莫名奇妙的交往。小说分层叙事繁复穿插,“词”与“物”产生奇妙的想象关联,使得《恶水之桥》分明在“元叙事”的挪用上,增添了审视时代异样的哲学风调,先锋性探索格外机智。

新时代“自我”面向所开启的宏大叙事,无论涵溢、澎湃,总之有其多样化的神思理路可供选择,各自界临的叙事迷津,为文学提供了丰饶的探索可能。2018年度中篇小说为“中国好故事”铺事增华的实绩,稳定中求新,从容别致,若隐若现。

## “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

——2018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上榜作品一瞥 □王春林

从文体的角度看,2018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大约可划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中国本体的艺术传统相关联,乃至一种具备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一种阔大气象,类似于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我更多地采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至于所谓“现代型”,则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切体认,从其基本的美学艺术追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不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再追求人物形象的众多,不再追求以尽可能立体全面地涵括表现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在篇幅体量明显锐减的同时,这样的小说极有可能具有深刻、轻逸与快捷的思想艺术品质。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与现代生活,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匹配,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界定命名为一种“现代型”的长篇小说。

李洱80多万字的《应物兄》,可以说是一部被作家酝酿打磨了好多年,称得上是“板凳能坐十年冷”的优秀作品。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正是一种突出的“百科全书”性质。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李洱前前后后耗费了13个年头。如此一个漫长的构思写作过程,也正是李洱对于他所表现的数十年知识分子生活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悉心观察与揣摩的一个过程。唯其如此,这部作品才能够如黄德海所说:“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之书”。

相比较来说,具有突出“史诗性”特点的,是贾平凹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山本》。这部作品无论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来看,抑或从贾平凹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部史诗性特征特别明显的厚重巨作,既有

对秦岭颇具神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以革命为中心的一段复杂历史景观的精准呈现,称得上既是一部死亡之书,也是一部生命之书;既是一部呈现苦难之书,也是一部满怀悲悯之书。贾平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与他对秦岭这一特定地域以及那段特定历史的熟悉程度紧密相关。《山本》之外,另一部同样具有“史诗性”特点的,是刘醒龙以故乡为书写对象的《黄冈秘卷》。虽然说在《黄冈秘卷》的书写过程中,刘醒龙很明显地征用了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家族的生存经验,但这部作品却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一部家族小说。作家借助刘氏家族中的若干人物而嵌入到历史的纵深处,进而对充满着吊诡色彩的20世纪中国历史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部明显征用刘醒龙家族生存经验的长篇小说,与他那部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巨制《圣天门口》,事实上有突出的异曲同工之感。

另外三部作品,皆可以被纳入到所谓“现代型”的长篇小说行列之中。年已九旬的老作家徐怀中旨在书写战争的《牵风记》,既有对于战争残酷性的真切展示,也有对于将士爱情生活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价值立场的强力凸显。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长篇小说,刘亮程《捎话》的“现代型”特质也非常明显。作为一部思想蕴涵丰富的现代长篇小说,刘亮程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作家的现代反战思想更多地通过他笔端的史密斯这样的美国军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话,那么,陈河的《外苏河之战》较之于其他战争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目的区别处则在于,他通过对若干中国军人形象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塑造,格外精准地捕捉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下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以上,笔者挂一漏万地对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6部长篇小说做了一番不失粗疏的盘点。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思想艺术命题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個作家,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具有思想艺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来,恐怕都既少不了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理解与认识,更少不了一种艺术构型能力的具备。

长篇小说：

徐怀中：《牵风记》

《人民文学》2018年12期

李洱：《应物兄》

《收获》2018年秋、冬季号

刘醒龙：《黄冈秘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贾平凹：《山本》

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

刘亮程：《捎话》

《花城》2018年第4期

陈河：《外苏河之战》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

# 文学如何「凝聚」我们的生活

——2018年短篇小说印象 □段守新

之外,历史叙事则作为一条重要的支线,与之始终相伴相随彼此激荡。2018年度,有关“当代史”的文学书写,就其涵容、分量以及力度而言,仍然有精彩的表现。麦家的《双黄蛋》讲述的是“文革”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社会的混乱与人心的邪恶互为因果,由此所爆发的破坏力,着实令人瞠目结舌,惊心动魄。石舒清的《凌伯的故事》通过一个老志愿军战士的口述实录,重现了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战争亲历者的个人视角,以及口语体的叙述方式,既使历史不再冷凝,融解为一个个真切鲜活的细节,有着强烈的现场感,也有着时过境迁之后对历史与人的沉思、咀嚼。肖凡的《特殊任务》,写“大饥荒”时期小人物如何竭尽所能相濡以沫,特殊的时代氛围、心理状态以及扎实绵密的历史细节,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其实所谓“综述”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为某年度的文学创作绘制一幅巨细无遗的地形图,毋宁说在于经由一些具有特别的文化和美学意义的坐标,一窥我们的文学如何凝聚了我们的生活,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包括它所抵达的前沿和高度。有鉴于此,遗珠之憾往往在所难免,这是需要特别说一声抱歉的。

短篇小说：

莫言：《等待摩西》

《十月》2018年第1期

范小青：《变脸》

《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慢先生：《魔王》

《花城》2018第6期

弋舟：《如在空中，如在水底》

《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

麦家：《双黄蛋》

《收获》2018年第3期

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

《收获》2018年第2期

夜子：《旧铁轨》

《十月》2018年第5期

潘军：《泊心堂之约》

《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

裘山山：《听一个未亡人讲述》

《青年作家》2018年第1期

秦岭：《天上的后窗口》

《芙蓉》2018年第3期

与许多观察者所称道的2018年是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相比,本年度的短篇小说创作,未免显得有些平淡。相对于中长篇,短篇小说的“边缘化”趋向日益显明。这里当然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除了那些外在的社会文化原因,我更愿意强调短篇小说自身艺术品质的下滑,对于它的现实境况所负有的不容推卸的责任。格非曾说,“在所有的文体中,只有短篇小说能够让人产生叙事可以接近完美的期待。”这确实是一种迷人的诱惑,然而,同时也是一种折磨人的挑战。可惜的是,在当前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已经很少再能看到这样的激情和志向。更普遍的,则是一种疲沓的、慵懒的、软滑的和机巧的惯性写作。

在弋舟笔下,我能触摸到某种稀少的“硬度”——因为精神对现实世界的抗拒而带来的紧张感、倔强感、锐利感。弋舟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那么一点或隐或显的“病状”。而就其精神底色而言,他们其实大都是现实世界的疏离者、不感应者和不适者。《如在空中,如在水底》里的蒲唯也不例外,他和程小玮重返18年前的旧地,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只为等待那时候一个朋友的许诺:18年后,她会寄一封信给这里。虽然这封信最终没有等到,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试着靠近过那道光,从而和一些有希望的东西再次发生了联系。为此,他们前仆后继,不惜涉险——即便那莫须有的事物宛若捕风捉影,即便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时间与生命、期待与失落、挫败与希望、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哲思,以及写实与神秘等等,缠绕在作者充满诗性和感伤意味的叙述里,使小说的意蕴丰厚而又空灵。

范小青对现代化过程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变化,始终保持着超高的灵敏度,且传达得又那么迅捷和得心应手。借助于一个个个见的,然而又释放着强烈的时代信息的物事,比如名片、手机、电子邮件、车位、房产等等,她近乎全方位地实现了对我们变动不居的现实的无缝式“对接”。《变脸》瞄准的是日益普遍的“刷脸”技术给人造成的困扰。艾老师因为机器无法识别他的脸,不能买房,也不能玩手机,生活变得一团糟。基于日常细节的观察,戏谑化的叙述风格,以及不无荒诞意味的主题,三位一体式地构成了范小青这一系列小说的叙事基石。

确实,“变”(变动、变革、变故),已经成了我们不变的生活主题,我们刻骨铭心的现代性经验。正是在这一时代共名的笼罩下,不同的作家,基于不同的人生阅历、精神体验和文化立场,发出了不同的艺术变奏。邓一光的《香蜜湖漏了》、秦岭的《天上的后窗口》、徐则臣的《兄弟》等,或写城市或写乡村,或写底层或写中产阶级,或对自然生态表达追怀,或对传统文化进行“复魅”,又或致力于对人的心灵孤独的关怀,不一而足。

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各界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而一些文学作品,也恰恰与之不谋而合。比如莫言的《等待摩西》、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王手的《平面玻璃》,都力图在一个更宏阔的历史跨度里,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情感的悲欢。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慢先生的《魔王》。小说的题目泄露出它与舒伯特的同名音乐作品的某种互文关系。只是,在后者那里,儿子之死,来自于神秘的命运的力量,他的父亲对此无能为力。而在前者那里,则是来自于父亲内心的魔鬼。小说故事本身浓重的悲剧性,与叙述语调的克制和内敛,构成了强烈的张力,令人有撕心裂肺之痛。

现实经验的表达一直是新世纪小说的主流叙事。在此